

Z时代职业院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研究

——从提升辅导员媒介素养出发

王鼎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Z时代职业院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现状以及对提升辅导员媒介素养的建议。通过深度访谈7名在读大学生发现,Z时代职业院校大学生在媒介安全素养、媒介交互素养、媒介学习素养、媒介文化素养等方面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因此,从提升辅导员媒介素养出发,强调媒介素养教育要尊重参与者在地经验,促进个体媒介素养提升。

关键词: Z时代; 大学生; 媒介素养

所谓“Z时代”,通常指千禧一代之后的青年群体,又称互联网世代,统指受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Z时代的鲜明代际特征是网络化生存,在一个网络全面覆盖的社会,Z时代作为网络的弄潮儿,网络化生存已经成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10~29岁的Z世代网民占比达到28.4%,学生网民中至少掌握一种初级数字技能的比例达98.5%,至少掌握一种中级数字技能的比例达81.0%。由此可见,在互联网这个独特的舞台上,Z时代大学生谙熟各种社交媒体软件及其生态并活跃其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然而,对互联网高涉入度的Z时代网民是否有较高的网络安全意识呢?众多数据表明,网络化生存的年轻一代也让他们接触到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网恋陷阱、网络求职陷阱、网络色情信息等引发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对于本课题来讲,就是在此背景下从辅导员的视角试图窥伺大学生媒介素养情况,深入了解其中的实践情况也为提升辅导员媒介素养提供一些本土经验。

一、研究脉络与研究方法

涉及大学生与媒介素养的研究多采用两种途径。一看大学生接触什么样的媒介,如何使用媒介,把大学生看作媒介使用者,与其他使用群体相比在媒介素养上的特征与差异。这种研究最常见的是进行问卷调查,如王菁在《参与范式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一个实验研究》中采用教育实验法检验大学生媒介素养参与范式的教育效果,探究该教育范式应用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特点及其实践意义。

另一种是应用研究,意在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或媒介素养教育提出对策。如匡立波在《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路径研究》中应该创新德育教育理念、提高媒介素养的理论水平、开展媒介素养的实践活动来提高媒介素养教育水平。

两种研究都很重要但不全面。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考虑,缺乏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动态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对当事人看问题的视角十分重视,这可以帮助我从本人的角度了解他们在当下所受的媒介素养教育以及他们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解。质的研究重在微观层面对社会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这可以使我对大学生日常媒介使用行为进行探讨。质的研究允许选择小数量的样本,这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对少数大学生进行个案调查,从而更细致地探究他们身处媒介生态中养成的媒介使用习惯。

本研究抽取了7位在职业院校读书的大学生,而且我本人在学校担任辅导员,兼职思政课程教育,有利于接近受访者,与他们相处时间较久,更容易让受访者消除顾虑,敞开心扉。本研究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为半结构化深入访谈,辅以参与性观察和非

正式交谈。从2023年9月到11月期间,除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外,我还主持了一次集体访谈,向他们介绍和检验我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发现

(一) 媒介安全素养:第三人效果明显

媒介素养通常指使用、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这也是以“能力”为框架搭建的媒介素养内涵。学者卢峰整合了以“能力”和“过程”两种不同角度的媒介素养内涵,提出了媒介素养之塔的层次分析。媒介安全素养是指在使用媒介时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保证个人财产、生命等安全的能力。媒介安全素养是最低层次的素养,但也是在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中最予以重视和保障的一块内容。

“在新生的入学讲座中会有专门的防诈骗内容,但好像大家都不以为意。”(鹏飞,2023/11/6)尽管在如今大学课程体系中并没有系统化的媒介素养课程,但在入学教育和平时的思政课堂上,老师都会穿插讲授诈骗案例、防骗手段,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网络安全意识。在一些特殊的节点上,学校还会举办“民警进校园”专题安全专题培训活动,但总是参与者寥寥,更多的时候还要配合班主任的“威逼”还有加分的“利诱”才能让学生走进培训现场。这种局面的造成除了活动组织缺乏吸引力等客观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生普遍存在认知上的“第三人效应”。美国学者戴维森认为:人们倾向评估负面媒体信息内容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当笔者在访谈中问及对自身媒介安全素养评价时,被访者纷纷表示自己有较高的“安全等级”,而且列出之所以缺乏较高媒介安全素养的原因。

关于第三人效果的成因,既有的研究大多从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在访谈中,大家对诈骗知之甚少,有囿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归因于受访者的乐观偏差。尽管大家表示自己身边都有过朋友被骗的案例,但当问到自己是否担心被骗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有较强的发诈骗意识。“他们被骗就是过度信赖陌生人,做事不够谨慎,我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新雨,2023/9/10)事实上,这种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不可能成为网络诈骗受害者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采取预防措施的行为方式,这也解释了他们在学校组织防诈骗讲座上漫不经心的原因。

(二) 媒介交互素养:高频率与媒介化

媒介交互素养是指媒介使用者与媒介进行交互或利用媒介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能力,既包括人与媒介进行的互动,也包括人与人直接的交互。在全民媒介化生存的今天,这种交互素养是必要的,不仅仅是“会用”,更重要的是“用好”。根据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1个小时,而在访谈中受访者高达35小时。Z时代大学生依赖互联网满足自己的定向或非定向需求,所谓越使用、越依赖,也是媒介依赖理论的重要内涵。

年轻人对于媒介依赖的影响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这次研究中,笔者也着重访谈了他们在媒介交互中的具体消费内容。但较为悲观的是,游戏(原神、云顶之奕等)、抖音、微信是媒介交互的前三项内容,而且游戏、抖音所占时间比例超过了67%。尽管在既有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发现了青年群体在媒介交互中积极的一面,但在日常的媒介交互中,打发时间、追求短暂的快感,特别是人际交往成为人与媒介互动的主要因素。“大学课业比较少啊,大学这个阶段学习已经不再是很多人的首要目标,而且在人际交往上的需求会更加大于其他方面的需求,不单单是为了娱乐。”(章章,2023/10/21)在这里,我们发现,人与媒介进行互动和人与人直接的交互变得更加模糊化。大学生看上去只是在玩游戏,只是人与媒介间的交流,但游戏背后也是人,游戏亦能成为谈资。因此,更多的时候,打游戏承载了大学生之间互相交流的功能。“打游戏确实是能够比较快速升温大家关系的一个东西。”(金涵,2023/10/11)所以,在笔者看来,媒介交互中,交流的媒介化成为Z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 媒介学习素养:一边抄袭一边验证

媒介学习素养,是指使用媒介获取知识、学习技能、促进个人更好发展的能力。大学生面对技术革新带来的高度媒介化和信息多元化时代,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会运用手机或电脑上不同的应用程序。“学校开学就会要求下载很多APP,比如跑步打卡的阳光跑、考试用的学习通,充卡用的易校园等等”(陈坚,2023/9/15)在教育同样高度媒介化的今天,学习过程与媒介已然不可分割,学会使用媒介是媒介学习素养的第一关,当然对于这项技能的学习,学生都可以轻松掌握。

同时,对于大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分辨媒介信息真假以及评估信息价值大小,甚至需要不断提升分析信息的能力。但在访谈和日常的实践观察中发现,大学生则更依赖互联网进行网络搜索得到确定的信息。这里所谓的学习并不是探究为什么,而是想知道是什么,仅此而已。笔者在《思想与道德法治》这门课程中布置了五次作业,在诸如完成《理想国》读后感这类作业中,学生无不利用网络进行抄袭,导致在随后的作业布置中,思考一些生僻的问题来让学生回答以避免网络抄袭现象。因此,在笔者看来,某种程度上,大学生的媒介学习素养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丧失独立性的风险,更遑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精进的背景下,进一步产生对媒介的高度依赖性,弱化学生的学习素养。

除此之外,进行各类“网络求证”似乎已成为Z时代大学生的显著特征。当微薄、小红书等社交媒体成为他们的聚集地,去哪里玩、怎么样去追女生、其他人怎么看……这类问题往往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答案。但从媒介素养的初衷来看,关键是要形成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创造信息的能力。在访谈中,“网上说”已经成为大学生论证自己观点的重要来源,当然,不管是多么离奇的观点,都会在相似的社群找到安慰。因此,大学生往往面临“信息茧房”的困境,萌发独立的观点也会面临更多地同侪压力。有同学也表述着类似的困扰,“互联网上信息量又多又复杂,有些时候去求证也会面临困惑的局面。”(子叶,2023/10/14)对于他们来说,怎么样利用媒介去获取高质量的信息,真正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促进个人更好发展,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四) 媒介文化素养:技术的驯化

所谓媒介文化素养,是指使用媒介时应具有的文明、文化自觉、国家主权等能力,是媒介素养之塔的最高层次,也常常被看作媒介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西方学界达成一种共识,即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是实现“赋权”与“解放”,在媒介技术不断革新的当下,这个目标似乎看上去更容易实现,其实,这仍然是一种奢望。

随着媒介技术的演变,大学生所具有的媒介素养愈发与技术

相对应的媒介环境和体制脱不开关系,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Z时代大学生网络用语的明显增多。笔者在日常与学生互动时,面对新兴的网络语言也会不知所云,如“CPU干烧了、热skr人了、走花路”等等。面对网络造词热,从网络新词的生成逻辑分析,往往与媒介的变迁密切相关。媒介化生存下不断兴起的网络圈群是网络新闻不断兴起的培育土壤,在社交媒体中不断寻求相似群体,从而建立起以趣缘为导向的网络圈群。尽管各种“暗语”是从圈内向圈外扩散,但各种移动媒介充当着网络新闻传播的重要扩散载体,使得网络语言的转变时间不断缩短。

网络用语作为一种呈现格式被媒介技术驯化成一种特殊的句法结构,除此之外,媒介技术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也会对Z时代青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就西尔弗斯通等人关于媒介化的研究中,他们认为电视进入人们的私人空间,使得传媒技术成为家居组成以及日常生活场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对于私人空间僭越,甚至是对人们生活空间的重构。这种影响当初就是以方便用户需求、必需品等日常叙事在日常消费中不断驯化的,无独有偶,上网冲浪、玩游戏也被同样的说辞所形塑。“大家天天都在关注热点,而且上网确实也很方便让我们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小卫,2023/11/15)在互联网上,媒介技术的“驯化”先体现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把“买手机”作为一种必需品,而后在日常的互动中,使用手机不断追逐互联网上的潮流、形成趣缘圈群,甚至具有明显的话语边界。媒介使用时的意识形态霸权又躲在暗处,按照媒介文化素养的应然要求,绝非简单进行批判分析媒介信息可达到的。

三、研究建议

笔者作为媒介素养的教育者,研究终究要回归实践中。尽管职业院校大学生所具有

的媒介素养与学者的期待仍相差甚远,但如今媒介素养在技术的加持下是一个远比基本的文本理解力和学习力复杂得多的概念。而且现实也在不断提醒教育者,媒介教育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对媒介一无所知的人们,实际上,Z时代大学生早已在网络化生存中积累了基于切身体验相当丰富的媒介认知,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教育者有更深的媒介处理经验。

在既有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策略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媒介本位出发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譬如开发系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促进个体形成理性认知,或是教育者要增强新媒体的应用意识和驾驭能力,强化高校思政课程的引导力等等。但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重在构建个人知识观,让学生在学上能够将媒介素养所强调的技能加以迁移,成为一个思想上能够健康思辨的人。因此,媒介素养教育一定要尊重参与者,就要从参与者的经验出发,媒介素养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以受众为中心,根据他们的经验设计教育体系和知识内容,引导式促进个体的赋权。总之,媒介素养是一个个人解放的过程,不能造成新的文化压迫。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8-28].<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2] 王学俭,靳海龙.大数据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36(06):142-146.

基金项目: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2023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项基金项目“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提升路径研究”(SZ20230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鼎(1993—)男,山西汾阳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助教。